

新作点评



三棱镜，这种三角形透明体可以使光束发生色散现象，甚至分离出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色光，使得光的世界呈现五彩缤纷的多样性。可以说，《大江大河》的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它是一部以电视剧样式书写的，以三个男人命运为核心的三棱镜式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时代史，同时向观众释放出社会改革深层的色彩斑斓的画卷。

首先，它体现出一种开阔的立体史观。“大江大河”之“大”，是通过剧中宋运辉、雷东宝和杨巡这三位男性不同的人生轨迹体现出来的，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即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及其变迁。我想，假如继续摄制第二部的话，还可能出现第四种经济形态即海归梁思申所代表的外来经济形态。它表明，中国社会改革史不只是国有经济一家的改革史，而是包含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内的全方位的立体史。国有经济的比例虽然在下降，但仍然具有经济主导的地位和作用，依然是国民经济形态中的主导力量。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都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前者代表民间的集体生产力，后者代表民间的个体生产力，二者为国民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三位男主人公分别代表一种国民经济形态，这些经济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运行都涉及千家万户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该剧展现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全方位、立体式进程，所有的个体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到这一宏大的历史浪潮之中。

其次，它展示出一种积极的变革史观。正是变革，使得“出身不好”的宋运辉得以借助恢复高考的机遇考上大学，一举改变命运，成为金州化工实施改革的弄潮儿；雷东宝可以带领小雷家人集体脱贫致富；只会卖馒头的小个子杨巡可以成长为个体户老板。这些都表明，只有变革才能给原本贫苦的人带来奇迹，焕发生机。

再次，它表述了一种冷峻的浪淘史观。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史宛如一条兴亡起伏、盛衰交替的长河，其滔天巨浪一旦涌起，必将浪淘尽所有的人和事：有的升起，有的沉落；有的朝前奔涌，有的向后退缩；有的汇入主流，有的则被冲刷到边缘。苏轼脍炙人口的诗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其中便蕴藉着一种历史兴亡的深重感慨：人类历史就像滔滔东去的大江一样，将身处其中的人和事无情地淘洗、筛选或甄别，让其分别成为浪花或沉

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面三棱镜

□王一川

渣、主流或边缘、英雄或败类。就拿《大江大河》的主要人物和事件来看，无论是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个体经济，也无论是宋运辉、雷东宝还是杨巡，无不在这场改革浪潮中经受洗礼。书生气十足的金州化工总厂技术干部宋运辉，带有军人粗犷气质的小雷家村支书雷东宝，勤劳而又心眼灵活的个体户老板杨巡，都得在改革浪潮中接受浪淘的考验。他们每个人各有长短，各有人生定数，谁也无法超脱于这场冷峻的淘洗之外。

最后，它建构起一种深厚的心功史观。正像王阳明“心学”所揭示的那样，重要的是人们自己如何“在心上用功”。宋运辉为人正直，以技术为人生理想，虽然他在金州化工改革中一度扮演弄潮儿的角色，但由于他的“心”从不用于人际权力关系的协调，终究难以做成大事，还有可能在激烈的权力角逐中身陷难保。雷东宝以其勇气、豪气和聪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但一旦进入改革深水区，这个“粗人”就难以继了。杨巡具备超一流的见机行事能力，善于实施个体经济转型，但缺乏“心”的修养，格局太小。宋运辉的大学同窗虞山卿一味相信并依靠拉关系实现自己的个人欲望，不思悔改，终究还是败给了自己。其工厂同屋寻建祥以流氓习气做人行事，难免遭到判刑坐牢的惩罚。小雷家老书记虽然对雷东宝有恩，但后来为解决家庭困难而贪污公款，落得以自杀谢罪的下场。他们的事例都说明，“心功”不足，必然不足以成事。

此外，特别应当指出，宋运萍这一人物的设置，在剧中富有特别的深意。她宛如孤石傲然屹立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巨澜中。她使我不禁想到靳尚谊的名画《塔吉克新娘》(1983)中那位新娘，美丽、清纯、善良、温柔，对未来幸福生活充满憧憬，但又心怀某种隐秘的疑惑或不安，令人怜爱而又同情，不禁生出强烈共鸣。她具有一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使其具有一种恩格斯所谓“诗意的裁判”的力量。她既像一面魅力四射的镜子，又像《史记》中那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冷峻“史官”，让剧中几乎所有人物，以及观众自己，都不得不被放到她这面镜子或眼光的映照下自我审视。宋运萍纯美而冷峻的目光，至今仍在清澈透亮地凝视和抚慰着在改革开放时代洪流中不停浮沉的每一个中国人。

关注

2018年12月30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主办的“2018十大国产影片推介发布会暨2018中国电影回顾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公布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2018十大国产影片”推选结果：《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无双》《影》《无名之辈》《邪不压正》《暴裂无声》《阿拉姜色》《一出好戏》《找到你》。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对2018中国电影的分析与回顾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谈到，2018年中国电影涌现出了不少好作品，尤其是新人作品。近年来提升中国电影质量的各种努力已初见成效，中国电影正在从产业增长的黄金十年走向质量提升的黄金十年，中国电影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大洗牌正在发生，通过洗牌淘汰浪费资源、无效传播的电影生产，形成稳定的有质量保障的生产体系，其发展的态势比我们想象的好。

中国影协副主席尹鸿将中国电影目前的状态总结为产业遇到寒冬，创作遇到暖春。2018年中国电影成绩的首要表现是现实主义创作大有成效，特别是主流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现实主义与以往的悬浮式现实主义和边缘现实主义拉开了距离，例如《我不是药神》。除此之外，今年的中国电影中还有形而上的寓言式电影出现，《邪不压正》《一出好戏》《无名之辈》等一些作品的艺术高度有所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学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2018年中国电影表现出情感写实主义的状态，这是中国电影的传统，例如早期的《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情感写实主义影片的特色在于触及小人物的小命运，它们通过感情线索拉动写实。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钟大丰认为，2018年产生了很多高水平以上的作品，现实主义创作表现出影响观众、影响市场的特点。今年的现实题材电影满足了观众对现实的情感宣泄需求，把现实中人们的情感转化到故事中，这些创作给以后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经验，因为这些创作把人们熟悉的故事讲述成了动人的故事。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谈到，2018年中国电影不论是现实主义的、寓言体的、艺术探索型的，还是类型化的电影，大都加强了思想内涵的深度，并被观众所接受。与此相反，粗浅表达简单欲望的平庸类型片开始被观众冷落。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赵卫防说，2018弘扬主旋律电影也出现了一些反概念、反老套、反平庸的创新亮点，例如《照相师》不仅表现出改革开放40年的物质表象的巨大变化，还表现了人们在观念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大路朝天》不仅表现了路桥工人修筑了柏油之路、钢铁之桥，还修筑了自己与他人沟通的心灵之桥、自己与社会协调的精神之桥。

《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李春利说，2018电影

正在回归理性，比如不再唯票房论，而是冷静下来去思考电影的艺术特质；不再唯明星、唯流量，有些片子不用大明星效果也不错；包括宣发上，以前都是花边营销，现在讨论艺术本体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总之挣脱了资本的束缚，褪去行业浮躁之后，艺术家们更能静下心来创作思考。

《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认为，2018是中国电影主流大片、主流人物、主流现实主义的回归。她强调“主流”就是贴近大众、反映大众这样的现实主义电影，今年优秀现实题材作品对社会乃至人类都有深刻的思考，对社会进步有推动。

北京电影学院讲师叶航谈到，2018中国电影表现出技术成熟与文化表达的有机融合，例如《影》在表现三国乱世的叙事过程中，视觉美学和拍摄技术均为上乘，其中国文化与技术特效达到了和谐统一。

专家们指出2018中国电影制作中依然存在备受观众冷落的空洞无聊之作，也有违反电影工业规律导致票房低迷的惨败之作，身处中国电影产业报道一线CCTV6中国电影报道主编宋子文谈到，2018的中国电影产业有些地方存在隐忧，例如票房大战、发行乱象、预售风波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和相关电影产业秩序的调整对未来10年电影的发展非常重要。

“影视独舌”创始人李星文说，目前进入贺岁档的电影均不理想，观念陈旧没有新意。贺岁档表现乏力，2018年中国电影经历了高开低走的过程。

李星文描述了资本寒冬到来的现实，其表征是横店以前在报道拍摄的影视项目时从不提网大电影和网剧，现在竟然以网大和网剧充数。尹鸿认为中国电影面临舆论失控、产业失序、市场失范三大风险，但倒闭的一定不是优质公司，寒冬必将过去，春天一定到来。饶曙光认为电影产业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未必是好事，其实12%的速度正合适，以质量推动可持续发展，带动产业走出寒冬。张颐武认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比想象的路更长，目前中国电影资金进入美国好莱坞被高度重视。

“影视风向标”创始人胡建礼认为，青年导演的涌现是2018国产电影的一道亮丽风景，诸如文牧野、陈思诚、闫非、彭大魔、田羽生、刘若英、黄渤、苏伦、饶晓志等导演都以自己优秀的电影创作表现令人刮目相看。钟大丰认为：青年演员的更新换代跟不上青年导演的更新换代，青年演员还没有拿出得出手的、像样的表演作品。

(许莹)

创作谈

我为什么要将黄大发的故事写成电影

英雄的故事值得传说

□韩 炜(电影《天渠》编剧)

“血管”。在绝壁高坡的水渠边上，能够看到很多黑疙瘩，后来知道那是喜欢走峭壁险道的山羊留下的屎蛋子。上世纪90年代，黄大发和他的村民们就是在这样只有山羊才喜欢走的山坡上，用最原始的工具，用自己一背篓一背篓背起来的炸药、水泥，炸开岩石，筑起一道万米长渠。

那天，有那么一瞬间，回头看去，老人在绝壁天渠小歇，其身影与身后的山岩浑然一体，令人肃然起敬。

2017年我将这个老人的故事写成了电影剧

本《天渠》，2018年12月影片在全国公映。

《天渠》是一部写活人和真人的电影，不是一个牺牲的英雄，或者一个过世之后得到追认的楷模，更不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悬浮人物。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殊为难得的机会。

黄大发以及他做的事，让我想到中西方两个神话寓言中的人物。

一个是中国古代寓言中的“愚公”。黄大发是以世俗所谓的“愚”和“迂”，来成就伟业的，用工匠精神、亮剑精神来改天换地的。比如修渠过程中，他的妻子想要区区一碗水泥，修补一下自家的灶台。黄大发坚决不干。这与其说是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毫不利己”的本能、公私分明的偏执，这才使得所有对他决定心服口服。

我相信，支撑着黄大发以及跟随他修渠的数百名村民一寸一米地挖出水渠来的至强念头，不是要“胜”天，而是不要“输”命，他们没有要改变大自然，只是要在大自然的布局中找出一条活路！从某种程度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同脉的。

黄大发还让我想到西方神话中的一个悲剧

英雄西西弗斯。西西弗斯绑架死神，希望让世人

永生，因此触怒了众神，受到惩罚，每天要把一块巨石推上陡山，再眼看着巨石滚到山脚。西西弗斯要永远地、似乎没有任何希望地重复着这个毫无意义的动作，诸神要让他的生命在这样一件无效无望的劳作中慢慢消耗殆尽。

在采访中，黄大发带我们去看过他们在上世纪60年代修渠失败的一个涵洞。这个小小的人工涵洞曾经花费了他们数年的时间，但是最后证明对于引水来说是完全无效的。以后的20多年时间里，可以想象那种重复、枯燥的劳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失败，是如何消磨着黄大发和他的老伙计们的心神的。以至于到了90年代再次修渠的时候，黄大发的决定受到了来自他最信任、最亲近的伙伴们的质疑。黄大发在绝望中不放弃，将苦难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忽视枯燥，摈弃绝望，将推石上山和滚落山下，将成功与失败都化作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西西弗斯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作家加缪写到：终于有一天，西西弗斯在这种孤独、荒诞、绝望的生命过程中发现了新的意义——他看到了巨石在他的推动下散发出一种动感庞然的美妙，他与巨石的较量所碰撞出来的力量，像舞蹈一样优美。他沉醉在这种幸福当中，以至于再也感觉不到苦难了。当巨石不再成为他心中的苦难之时，诸神便不再让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

黄大发和他的村民们一定是在类似一种推石上山的过程中，产生出这样一种奇妙的发现，他们脚下这片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土地，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陡峭的高山，一个个炮眼，一寸一米往前延伸的水渠，已经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他们的必然世界。水渠修成了，水由低处流向高处，村民们得救了，草王坝得救了。

能够通过写作一个剧本，去走近一个活生生的、不寻常的人物，并从他的故事中感悟诸多，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一件足以填满心灵的幸事。说到底，英雄的故事值得传说。



黄大发，贵州遵义播州区平正乡的一个村民，如果从2017年算起，老人已经在那个叫草王坝的小村子生活了82年，入党58年，在他当村长、村支书的46年中，前后花了36年，带领村民，在贵州大山的绝壁上凿出一条长9400米，地跨3个村的水渠。从2017年开始，黄大发获得了包括“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多个国家级荣誉称号。

2017年春暮夏初，《鸡毛飞上天》的出品方、杭州佳平影业的老总吴家平先生找到我，说要拍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位贵州老人，花了一辈子，带动全村人挖了一条绝壁天渠。几天以后，我和这个项目的制片人一起飞往遵义，经国道省道乡道，又沿着一条刚建成尚未通车的山路，辗转来到贵州遵义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原草王坝村)，见到了黄大发老人。

在老人居住了半辈子的老屋里，我见到了无以言表的清贫景象。其真实程度令后来的电影置景人员根本无法还原。老人没有来得及讲述他的“事迹”，径直把我们带上山，去看看他的“大沟”——那条被大家称为“天渠”的水渠。老人健步如飞如履平地的样子，胜过千言万语。沿途中老人随手清除着水渠里淤积的杂草，告诉我们，20多年来，只要他在村里，每一天他都要上山来走一走，清淤疏堵，因为这条“大沟”，是全村人的

12月26日，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承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电视剧《大浦东》研讨会在京召开。该剧讲述了上海浦东洋泾老街的三代人在改革开放历程中勇于创新、艰苦创业的故事，再现了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的时代变迁。与会专家认为，电视剧《大浦东》在举国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节点，由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标志着现实题材海派电视剧的强势回归。

作为浦东开发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浦东新区第一任书记赵启正表示，电视剧《大浦东》使他倍感亲切，该剧对记录浦东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他谈到，浦东开发是艺术家创作的富矿。人的升华是浦东开发最容易被忽略的重要成果。《大浦东》聚焦浦东开发进程中人才的培育涌现、农民的转型成长，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自信，视角独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表示，电视剧艺术作为时代的号角，最能反映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尚，绝不能放弃站在时代潮流前端，敏锐地捕捉具有标志性意义和代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成果的题材。该剧开掘了浦东题材电视剧创作的第一桶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表示，浦东开发、开放是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该剧选取的题材不是地域性题材，而是一个重大历史题材。与会专家纷纷表示，浦东开发是改革开放40年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其巨变背后承载的正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讲，电视剧《大浦东》的题材选择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对浦东大开发的影视呈现，能够让观众从浦东这个典型样本中重温和回味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可以说从宏观到微观，从行业设定到性格设定，都充分体现出个人奋斗与时代、国家发展的休戚与共。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认为，只有深入生活，走进改革开放第一线、经济建设最前沿、社会生活的最基层，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感悟群众生活，与群众的需求接轨，才能不断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大浦东》赢得广泛好评，充分说明该剧从金融改革的角度聚焦变迁，讲述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人物成长与时代休戚与共的故事是成功的。《大浦东》总出品人、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谈到，很多主创人员都跟上海的城市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就是在这座城市成长起来的，对这座城市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这部剧既表现了这座城市30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又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浓浓的烟火气息。与会专家谈到，《大浦东》的重要意义在于掀开了金融改革的序幕，从艺术角度反映了金融企业在国家改革开放中所扮演的角色，填补了金融领域影视作品的空白。该剧对历史脉络的精准记录和历史变迁、人物命运的鲜明刻画，已然具备了史诗品格。也有不少专家认为，该剧在呈现海派文化特质和地域特色的同时，更具有难得一见的国际视野。剧中塑造的三位金融才子在大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以及在追求事业过程中的起伏历练，都展现出了浦东初创时期的艰辛。

(小玉)



海派电视剧《大浦东》展现金融改革风貌